

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从历史看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的制约¹

摘要：本文从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制约，来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学术自由的状况。作者认为，尽管人们通常会强调制度的力量，也即结构的力量，但是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制度和制度文化。从个人因素上讲，从来就有一些学者坚持自己思想的自由、独立和批判性，并敢于承担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协助统治者压制自由思想。

学术自由在世界各地都面临危机。学术自由这个概念是普世性的吗？它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这样一个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以专制著称的社会吗？

本文认为，学术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尽管在古代并没有用这个词语来称呼它。从结构上讲，不同的政治制度会在不同时期对思想自由或者说学术自由有不同的影响。从文化上讲，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对学术及思想自由就有针锋相对的看法。随着中国从19世纪开始与世界互动，这一概念开始获得了西方的一些特征。从个人因素上讲，从来就有一些学者坚持自己思想的自由、独立和批判性，并敢于承担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协助统治者压制自由思想。可以说学术自由是一个普世价值。

本文将首先简要总结古典社会学家如何看待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在约束或促成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在中国历史上、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学术自由或思想自由是如何被对待和实践的。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制约，从而使得学术自由成为其在当时当地的样子。

结构、文化与个人之间的互动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历史的，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²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谈到了影响人类行为的三个因素：这里的“人们”指的是个人本身，而“条件”指的是个人发现自己所处的制度 / 结构和文化，他们必须与之互动。可以说，所有人类行为都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学术自由作为一种规范、价值观和信仰也是三者互动的结果。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如何解释这三个因素在约束和促成人类行为方面的作用，看看它们可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学术自由的历史发展提供什么启示。

结构对文化和个人的影响

我所说的结构是指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下面的阶级等社会关系，包括民主制度、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等。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和个人，就像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那样。下面是更多的例子。

当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时，他是说结构在影响文化。意识形态或意识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条件在影响着人们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看法。因此，统治某个社会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是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的物质关系（比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反映。

同样，韦伯（Max Weber）说社会环境或者条件，包括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获得收入的机会等等经济利益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属于哪个阶级。他说每一个官员只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阶层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个机制为他规定

了一条基本固定的行进路线。³ 这对在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中的其他任何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有力地说明了结构，无论是社会阶级还是官僚体制，可以对个人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也观察到，在强制分工中，个人只不过是机器中的一个惰性齿轮，由外力驱动，并始终朝着相同的方向、以相同的方式移动。他也谈到了社会环境在决定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方面的强大力量。⁴

我在讨论当代学术自由的结构约束时，列出了政府决策和法院判例在终身教职、言论自由、董事会组成、共同治理、紧缩措施等问题上的影响，无论是在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下都是如此。⁵ 我们编辑的关于学术自由的书籍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类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学术界的文化和个人行为。⁶ 在美国，川普第二任期通过政府权力对大学自治的侵蚀、对学术自由的干涉，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和本文下面所讨论的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历史上的例子相辅相成。

文化对结构和个人的影响

关于文化重要性的最著名的论述可能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但韦伯也说，他并不是要“用同样片面的唯心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来代替片面的唯物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释”。⁷ 换句话说，他认为结构和文化在影响历史发展方面都很重要。对于韦伯来说，思想内容、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变量。文化和结构都很重要，在社会分析中任何一个变量都不能被另一个变量所取代。⁸

马克思虽然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但是他并没有质疑文化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有时可以显得比当时的经验关系更先进，因此，在后来的斗争中，人们会将早期的理论家视为权威，作为自己的参考。⁹ 此外，“历史上所有的碰撞都有其起源……包括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¹⁰ 后者的例子可能包括各种阶层的碰撞、意识形态的矛盾、思想的斗争、政治冲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理解，即生产力与不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宗教、哲学、伦理学等之间的“相互”作用。¹¹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认为，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联系。虽然前者基本决定了后者，但是后者也在影响前者。¹²

文化在涂尔干的分析中同样重要。对他来说，集体意识，即一套明确定义的价值观和信仰，赋予了任何一个社会的统一性和个性。¹³ 个人需要履行外在的法律和习俗规定的职责。这些规范、价值观和信仰具有如此大的命令性和强制性，它们会将自己强加在个人身上。¹⁴ 任何人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就必须承担后果。

在关于学术自由危机的研究中，我讨论了民主国家的学术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公司化）和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的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对学术自由的影响。¹⁵ 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影响。文化不仅影响学者行为，也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文化、结构、个人三者互为因果，下面对中国历史上的例子的讨论也会强调这一点。

个人对结构和文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在论文开头提到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观点。社会学

理论家们确实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环境造就了人，就像人造就了环境一样。”“人是他们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是真实的、活跃的人”，尽管他们受限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与之对应的交往方式。¹⁶

这些创造历史的人是活跃的人，包括具有各种相应信仰的精英。例如，涂尔干观察到，专制者在他的个人身上所体现的是集体意识的道德统治，因此，对偏离其规范的行为所施加的镇压性制裁表现为独裁者行使的政治制裁。¹⁷至于普通人，他们只是模仿比他们高一等的人。导致人们模仿他人、相互服从的原因已经是社会性的。¹⁸虽然国家的作用是解放个人，但后者需要自己的组织（涂尔干称之为次级群体）来制衡前者的权力。¹⁹对于涂尔干来说，个人既是行动的主体也是社会影响的被动接受者。²⁰天主教徒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现成的信仰，而新教徒更像是自己信仰的建构者，²¹也说明了个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在讨论传统统治、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时，主要谈论的是政治领导人如何行使权力。一个能够蛊惑民心的政客无疑正在推动历史的转变。²²这和美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对于社会学理论家来说，个人在影响世界；与此同时，世界也在影响个人。个人确实作为社会现实的创造者发挥着积极作用。²³

对于阿伯特（Andrew Abbott）来说，个人是历史的核心，因为正是他们将过去和现在连接了起来，他们是历史的主要储存库，这就是他所说的个人的历史性。²⁴换句话说，它们是结构和文化的体现。“个体和社会实体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的；而且，他（它）们在某一时刻

（生态）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对话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些个体不仅是精英，也是普通人，“原子个体”是社会过程的主要单位，²⁵其他社会实体则是各种结构和文化。

在关于学术自由的研究中，我讨论了教授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捍卫自己的权利、美国的工会组织以及国际倡导团体的作用等。²⁶ 克拉克 (Burton R. Clark) 很好地总结了个人可能会做什么的问题：²⁷

当教授们感到自己这种敏感的权利在被受到侵犯时，他可以高举学术自由、科学研究的旗帜来反抗；他也可以焦躁不安，成为校园政治肌体中一个不断恶化的创痛；他还可以变得冷漠起来，退回自己的乡间别墅；或者他会向外界发出信号，准备接受别人可能给他的一个更优厚的职位，或许另外一个牧场上的草更绿一些。

换句话说，个人可能成为捍卫学术自由的积极成员，也可能成为命运的被动接受者。无论他做什么，个人都在发挥着作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结构上看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学术自由问题

我们在上面讨论了结构、文化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或者说作用。三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结构的作用异常重要，但是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而且结构和文化都是由个人创造的，尽管是在已有条件下的创造。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中国历史上，结构、文化和个人是如何影响学术自由的。我们将看到，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学术自由问题上也同样重要，同样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

古代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思想自由

政治制度的性质，比如是更专制还是更民主，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一个政权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结构层面的思维方式，它要么促进、要么阻碍自由的学术思维和辩论。这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当中国的政治控制支离破碎，或者说比较松散时，思想自由就会受到重视，学院、书院就会蓬勃发展。但是，当中国在政治上统一、强大、中央集权、独裁统治时，自由思想就会受到扼杀，学院书院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从结构上讲，学术自由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地位。

或许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思想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 770-476 年（春秋时期）和公元前 475-221 年（战国时期）。前一个时期，中国中部约有 170 个政治实体或王国相互交战不断，大国吞并小国，国王、公爵、诸侯相继被杀害。即使在后期，仍有七个主要国家在继续争夺权力。

国王和公爵们为了在残酷的世界中求生存，他们需要依靠文人学士为他们提供解决内外关系问题的思路。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帮助他们。这个时代几乎诞生了近 100 个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在每个学派内部还有不同的分支。这些学派的思想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等领域。²⁸

但对自由思想最严重的压制时期是公元前 221 年，秦国击败了其他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帝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始皇帝——秦始皇，奉行了无情的专制，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和其他学派的书籍被烧毁，得以保存的只有官方学者的书籍、支

持专制主义的书籍以及农业和占卜的书籍。400 多名儒家学者因批评秦政的残酷专制和皇帝的固执而被杀害。这些学者以古非今，认为秦始皇应该向以前的几位国王学习。²⁹

现代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学术自由

这种开放与压制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循环，在随后的 2000 年里多次重复，过去的 100 多年也不例外。1911 年至 1949 年中国大陆的民国时代与战国时期相似，中央政府不够强大，无法控制地方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等各种叛乱势力。各种政府和反政府组织都需要知识分子来支持他们。结果，后者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学术机构也蓬勃发展。知识分子自由地辩论“人民”、“中国”、“民主”等概念。³⁰ 就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也至少在战略上倡导民主，反对他们认为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但就像 2000 年前的历史一样，中共一旦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就发动了一系列运动，打压任何与中共意识形态（即自身品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矛盾的思想。毛自诩自己是当代版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比秦始皇更厉害。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³¹ 这是毛在 1958 年的讲话。在 1959 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共迫害了至少 50 万知识分子，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或其他劳改营。许多人死在这些苦难中。

即使在当代，历史也在重演。从 1976 年毛去世后到 1989 年，有一段改革

开放时期。民主再次成为当时的口号。中共政权正在考虑如何防止毛时代的灾难再次发生，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他们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但邓小平在 1989 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实际上结束了这个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开放时期。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尽管经济改革还在进行，但是政治打压却也在稳步加强，并在习近平时代达到高峰。

2013 年，习近平上台不久，便下达了“七不讲”令。学术自由已成为了政权的敌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在大学课堂上讨论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普世价值、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权贵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等问题，也无法撰写并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方面的著作。大学当局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的摄像头，学生线人须向当局及时报告教授在课堂上的任何越轨言论，即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言论。

相当多的教授因为在课堂上或网上的言论而遇上麻烦。中央民族大学的伊利哈木·土赫提因在课堂和社交媒体上倡导维吾尔族的权利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一些维吾尔族教授也是如此。更多人因在网上和 / 或课堂上发表批评中共及其国家的言论而被解雇甚至判刑，比如贵州大学杨绍正、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河北工程大学王刚、厦门大学尤盛东、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重庆师范大学谭松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³² 现在和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虽然可能被监禁或解雇，但不会被杀害。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例子表明，在结构层面上，政治制度可能会根据需要放宽或打压学术或思想自由。当国家分裂或至少处于转型时期时，会

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因为政权需要它，所以他们把学术自由看作一个正面的东西。当国家统一了、强大了，并且像现在这样更加专制或独裁了，统治者们会认为学术自由对他们权力是个威胁，因此他们会把学术自由看作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并且会压制学术自由。

如前所述，结构 / 制度或许是影响任何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问题上自然也不例外。制度既可以允许人们自由地思想，也可以极大地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大多数人唯唯诺诺，只有少数人敢于舍身求法。在川普第二任期，面对政府对他们的攻击，大多数的媒体、律师事务所、大学都选择赔钱和政府和解，而不是对簿公堂。尽管他们的案子胜诉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冗长诉讼的代价可能更大。在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情况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选择了及早妥协。这也是制度和个人及组织如何互动的一个例子。所以说这个结构的形成，还有赖于个人的作用，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互动，也包括文化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讨论这另外两个因素。

从文化上看思想家们如何对待学术自由

促进学术自由的思想

如果说中国历史在结构层次上分别存在着支持或打压学术自由的倾向，那么在文化层次上，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儒家认为当国家偏离儒家理想时，文人学士们有义务大声疾呼。比如“清议”运动就是如此，即学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而不是害怕政权的报复。³³

儒家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也是这个意思，即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和孔子的教导是一样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荀子，另一位儒家思想家，认为道德和正义高于一切。一个人应该从道不从君。

道教也培养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道教的主要创始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即“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即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³⁴ 於是在孔子时代出现了一批学者，被称为隐士，他们只对概念的阐释感兴趣，而不是像儒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官员。本着同样的精神，道教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说，他宁愿像泥沟里的一头自由的猪一样存在，而不愿意被官场所困。³⁵

这种追求真理和正义、反抗权威的自由精神，在之后的 2000 年里传承给了后来的学者、知识分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学术和政治追求中选择了一条批判性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问题。这一传统后来与西方的学术自由观念相结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质。

1898 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它“以东京大学为蓝本，而东京大学又受到法国和德国学术规范的影响”。³⁶ 1916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要求大学客观地研究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不同思想和价值观，自由辩论、自由选择。

通过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蔡元培将传统与现代联系了起来。（蔡本人就

体现了本文所讨论的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即使在当代专制的中国,北京大学仍然声称坚持学术自由是自己主要的原则之一。³⁷ 难怪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在接受一个研究项目的采访时,都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全方位的学术兴趣,以及他们是否可以在中国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教授们当然对政府筛选、审查具有“激进思想”和“独立生活方式”的学生的做法感到担忧。³⁸

正如我上面所讨论的,从文化上讲,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望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不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结构产生影响,正如前述社会学经典理论家们所阐释的那样。这一点在下面一节会看得更加清楚。

反对学术自由的想法

但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可能是对自由思想的压制。历史学家刘泽华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更多地是试图影响国王、君主,让他们采取自己的专制计划。³⁹ 例如,儒家思想的一些分支主张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等级关系,主张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他们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要求被统治者逆来顺受。这与我们上面讨论的自由思想是针锋相对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许多人遵循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成为了统治者的有机知识分子。商鞅和李斯(他们也是个人因素的好例子)帮助秦国推行了无情的行政和政治专制,焚书坑儒。法家相信法制、倡导耕战、主张君主独操一切权势、主张充分利用人们好利的本性来统治他们。⁴⁰

当今的国家主义就是在遵循古老的法家传统，为中共的一党专政或专制主义辩护。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一切的中心，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国家自身的繁荣与强盛。国家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它自己就是公共利益。⁴¹

国家主义并没有说它反对学术自由。但通过强调国家的权力，它实际上是反对学术自由的。因此，大学的作用是按照国家需要来扮演各种角色。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主张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例子。

总之我们可以说，当代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国家主义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敌视学术自由的，正如我们在第一节关于结构的部分也已经证明的那样。事实上，文化和结构彼此密切相关，它们要么支持学术自由，要么反对学术自由。文化和结构相辅相成。但是结构与文化内部以及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文献综述中所揭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自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无论是支持思想自由，还是反对思想自由。他们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行为的支撑。

个人选择支持或反对学术自由

在个人层面，学者们会评估结构和文化层面的视角，然后就所面临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是选择践行学术自由并承担可能的后果呢，还是协助统治者压制学术自由？本节将讨论这些截然不同的个人观点和实践。

秉持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东汉末年（25-220 年），三千多名文人学士发起了一场运动，批评政府的政治和决策以及皇室、宦官甚至皇帝的行为。该运动被政府镇压，两三百名士大夫，有时是他们的全家，被判处死刑、流放或监禁。这就是 166-169 年著名的党锢之祸。作为文人学士，他们一定知道政权和传统文化希望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们显然选择了思想自由和敢于批判的角色，在结构和文化都对他们有不同的而且是矛盾的要求的时候。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明代 1600 年代初东林书院的批判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是顾宪成。他在被迫离职回到故乡后的 1604 年重建了东林书院。东林士大夫和学生们经常评论时政，批判官员的腐败行为，要求改革，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像大约 1600 年前的党锢之祸一样，很多东林书院以及全国其他书院的学者和学生要么被处死，要么被监禁，他们的书院被摧毁。清初学者陈鼎写了 24 卷（外加两卷）的《东林列传》，表彰、纪念 180 位宋明两代的东林学者。

类似的迫害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1957 年，所谓的右派分子因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批评时政而受到迫害，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在习近平时代，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断批评政府及其决策。尽管他们不像秦朝、明朝或毛时代那样被处决，但刑罚仍然严厉，与古代法家的说法和做法精神一致。一些大学教授因批评政府而入狱，比如前面提到的伊利哈木·土赫提和新疆的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他们被指控犯有分裂主义的罪行，尽管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倡导宪法所承诺的民族自治。我在上面还列举了一些因为批评政府和党的政策然后失去工作的教授的例子。2020 年，三名公民记者前往武汉调查疫情。要么被关进监狱（张展），要么被严格限制活动（陈秋实），要么下落不明（方斌）。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有知识分子选择了行使批评政府的权利，这是在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都对他们有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时候，并且承担了相应的后果。

如果说一些知识分子相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选择了批评政府，那么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为专制辩护，从而扼杀学术自由。

反对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或最臭名昭著的、为专制政府出谋划策并充当变法大臣的文人学士或知识分子应该是为秦国以及后来的秦帝国服务的商鞅（公元前 390 年 - 公元前 338 年）和李斯（公元前 284-208 年）。商鞅领导了秦国的改革、建立了土地所有制（授田制）、奖励军功、建立君主集权的行政制度、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同时他也禁绝游说，焚烧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思想不鼓励他所实行的严刑峻法。任何不愿意从事耕战的人、事与思想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他还鼓励人们互相监视、告发，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此外，国家还要保持被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以达到民弱君强的目的。⁴² 至少他关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些管制政策至今仍在实施。商鞅死于政治内斗、被车裂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刑罚之一。

李斯后来变成了秦始皇的宰相，延续了前任商鞅的改革，包括进一步的行政制度的变更、明确地方官员的职责、规范语言文字书写系统等。但他也领导了最广泛的焚书运动，即不仅是儒家经典，还有其他任何“不必要的”书籍，都要被焚毁，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他还协助杀害儒家学者。不过和商鞅一样，他也在政治内斗中被腰斩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另外一

种最残忍的刑罚，类似商鞅所受的刑罚。

从古代快进到现代，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他们也被鼓励互相告发，批判任何与中国品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不同的思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受到惩罚。的确到了那个时候，中共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于党的、积极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也迫使其他人与党保持一致。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几无可能。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习近平时代。以下是一些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的例子。诚然，他们并不直接主张压制学术自由，但是反对学术自由是根植于国家主义思想之中的，正如我们从他们的言论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呼应的是大约2000年前商鞅和李斯的思想。

王绍光、胡鞍钢主张国家的主权性格就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也就是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对汪晖来说，国家就是党，就是政党的国家化，党国代表着人民的普遍利益。强世功认为党说什么就听什么，因为政治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服从与不服从之分。对他来说，朋友和敌人之间只有暴力和政府，没有自由问题。张维为甚至认为暴力就是善，政府是必要的善，而不是必要的恶。对于潘维来说，中共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韩毓海钦佩中共这样的政党，因为它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协调和动员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能力，以及对社会领域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当郑永年呼吁香港需要“第二次回归”田飞龙和陈端洪指责香港的社会运动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时，他们是在说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屈服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利益。⁴³ 以此类推，学术自由自然也会损害国

家利益，应该是不能允许的。

在当代中国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例子，即知识分子们自觉地选择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智囊。他们是政府的有机知识分子，有些也是政府压制学术自由的代言人。他们是商鞅和李斯的继承人，尽管他们可能不像这些古代人物那样冷酷无情。

简而言之，个人在结构和文化的影响下，因为结构和文化本身的矛盾，会做出不同的抉择，或者努力践行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或者加入反对自由的行列，或者沉默不语。这些都是他们在和结构与文化互动后的结果。如前所述，结构和文化也是个人创造的。所以三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学术自由的现状就是这三个因素博弈的结果。

结论

总之，从上述中国古代和当代历史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结构上讲，政治制度将自由思维视为一个务实问题。如果他们需要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时，他们就会鼓励思想与学术的开放。如果他们认为开放的思想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时，他们就会压制学术自由。因此，制度既可以鼓励自由的思想，也可以压制独立的思维，这要看自己统治当时当地的需要。

从文化上讲，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代的思维中，都有主张学术自由的成分，也有专制和独裁的文化特征。因此，关于学术自由，至少有支持和反对这两种观点。

就个人而言，有些学者相信学术自由，他们也实践学术自由，并愿意承担后果。比如有的学者会冒险进入禁忌领域，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七不讲”那样的领域，并承担可能的后果。但也有学者信奉国家主义，协助统治者打压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这在传统和当代中国都是如此。

正如我们在上文回顾里讨论的一样，在支持还是反对学术自由问题上，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制度、文化和个人都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外皆然。社会学经典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们对在社会发展中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的描述，也适用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包括对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的分析。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人们通常会强调制度的力量，也即结构的力量，但是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制度和制度，因为制度和制度都是个人创造的。反过来制度和制度又在持续塑造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支持和反对学术自由的成分也一直同时存在。所以制度、文化和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的问题，或者什么时候支持、什么时候反对、什么时候妥协、如何妥协的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上面讨论的结构、文化和个人在各自的内部与三者之间的冲突的结果显示，反对学术自由的趋势在各个层面都在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不乏支持学术自由、践行学术自由的个人。因此，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中国政权转变为像现在自由民主国家一样相信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权，这场战斗仍将继续，就像现在美国这样。因为制度、文化和个人的复杂性，这会是一场漫长、艰巨、永无休止

的战斗。

希望我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案例，也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案例，比如美国现在的情况；帮助我们了解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在影响学术自由方面的复杂性与重要性。简而言之，个人不仅仅是结构和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可以成为学术自由的积极推动者。正是这三个因素内部和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学术自由的成败，就像社会学经典作家所说的这三个因素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成败一样。

注释

- 1 本文编译、改写自本人文章："How Structure, Culture, and the Individual Together Constrain and Enable Academic Freedom in 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英文原文发表于 Frédéric Mégret and Nandini Ramanujam 编 *Academic Freedom in a Plural World: Glob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4). 对英文原文有所修改与增补。
- 2 见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ition,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8), p. 595.
- 3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81, 228.
- 4 Emile Durkheim,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78.
- 5 Zhidong Hao,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What, Why, and What Is to Be Done," in Zhidong Hao and Peter Zabielskis (eds.)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 (Springer Nature, 2020).
- 6 Zhidong Hao and Peter Zabielskis (eds.)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 (Springer Nature, 2020).
- 7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p. 183.
- 8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94.

- 9 同上,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 88.
- 10 同上, p. 89, 另见, p. 47.
- 11 同上, p. 58.
- 12 同上,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p. 209.
- 13 Emile Durkheim,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43. 也见 Anthony Giddens 为该书写的序言: “Introduction: Durkheim’s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p. 6.
- 14 同上, Emile Durkheim,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pp. 63-64.
- 15 同上, Zhidong Hao,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What, Why, and What Is to Be Done.”
- 16 同上,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p. 47, 59.
- 17 同上, Giddens, “Introduction: Durkheim’s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pp. 46-47.
- 18 同上, Emile Durkheim,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p. 77.
- 19 同上, pp. 197-202.
- 20 同上,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p. 71.
- 21 同上, Emile Durkheim,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p. 242.
- 22 同上,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pp. 78-79, 96, 103, 107.
- 23 同上,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pp. 210-211.
- 24 Andrew Abbott, “The Historicity of Individuals”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5, Vol. 29, No. 1, p. 3.
- 25 Andrew Abbott, *Processual Soci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p. xi, 1-2, 16.
- 26 同上, Zhidong Hao,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What, Why, and What Is to Be Done.”
- 27 Burton R. Clark, *On Higher Educa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56-2006*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1.
- 28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 《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第 115-119 页。
- 29 同上, 第二卷: 《秦至近代政治思想史散论》, 第 14 页。也见 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 Denis Twitchett &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 - A.D. 220*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102.
- 30 Timothy Cheek,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1 毛泽东,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1958 年 5 月 8 日。载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29.htm>, 上网日期 2015 年 8 月 13 日。
- 32 Scholars at Risk, *Free to Think 2019: Report of the Scholars at Risk 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 (New York: Scholars at Risk, 2019).
- 33 见 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7.
- 34 见前引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 第 333 页。
- 35 Zhidong Hao, *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 (Albany: SUNY Press, 2003), p. 35.
- 36 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6), p. 18.
- 37 前引, Zhidong Hao,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What, Why, and What Is to Be Done,” p. 4.
- 38 Robert A. Rhoads, Xiaoyang Wang, Xiaoguang Shi, and Yongcai Chang, *China's Ris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A New Era of Global Amb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39 见前引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 第 119, 220 页。
- 40 同上, 第 120-124 页。
- 41 郝志东, “如何理解国家主义知识分子”载于《端传媒》, 2020 年 9 月 2 日, 见: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00902-notes-opinion-intellectual-nationlist-china>。上网日期 2025 年 8 月 8 日。
- 42 见前引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 第 144-145、156-157 页。
- 43 见前引郝志东, “如何理解国家主义知识分子”。